

《新中华报》：“全国报纸中最好的一个”

林绪武

1937年1月29日,《红色中华》改名《新中华报》,刊号延续《红色中华》为第325期,五日一刊,承担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的职责,至1938年12月25日,共出版146期。

1939年2月7日,《新中华报》进行改版并以“刷新第1号”复刊,由五日刊改为三日刊,四开四版,使用“中华民国”纪年,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陕甘宁边区党委机关报,至1941年5月15日,共出230号。次日,与《今日新闻》合并为《解放日报》。



在艰苦环境中编辑出版

《新中华报》先后由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管理,用纸是延安振华造纸厂生产的马兰纸,印刷所用油墨来自延安石油厂矿的废渣油燃烧提取出的烟灰,并由中央印刷厂承印,最高产量“每月约排一百九十万字,到一九四一年秋,已提高到每月排三百万字,印张三百二十令”。发行工作先后由陕甘宁边区政府收发科、光华书店、新华书店负责,发行范围覆盖陕甘宁边区23个县与各敌后根据地以及部分国统区、敌伪区,在海外一些地区也能看到《新中华报》的身影。

《新中华报》的编辑部最初设在延安南门外西山上的三孔窑洞里,1939年改版后的几期时间内,该报的编辑是在清凉山上一孔大石窟内完成。随后,编辑部迁至杨家岭,1941年5月,再次迁回清凉山。开始时,编辑只有向仲华一人,既是《新中华报》社长,也是该报编辑,“还要自己校对,早先还得兼管发行名单……遇到警报,他把稿子往皮包里一放,爬上山头躲警报,坐在地上编稿子”,至1937年9月,该报改为铅印时才调来一个助手——左漠野,初期的《新中华报》便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中编辑出版,成为传播国内外重要消息的号角。

之后,编辑人员增至四五人,有向仲华、秦芙、柳风、柳毅、辛平,后陆续又从中央党校和中央组织部干部训练

班、陕北公学等处调进10多名工作人员,充实了该报的编采力量。艾思奇、柯仲平主编副刊,徐行白、沙可夫、白苓、唐起、黄药眠、徐懋庸、高敏夫等都曾为副刊写稿;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领导人均在《新中华报》上发表过题词、讲话和文章。

改版后的《新中华报》先后由李初犁、曹若茗担任主编。郁文、王辑、张映吾、叶澜、于敏、刘力夫、吴一榘等为该报编写人员。主要撰稿人有毛泽东、王明、任弼时、王稼祥、谢觉哉、徐特立、李富春、高岗、朱德、陈伯达、寒冰、周扬、丁玲、胡考等,荟萃了中央领导层、延安学术界、教育界、艺术界等多个领域的优秀人才。

《新中华报》的报道特色

《新中华报》拥有大量的通讯员。1939年3月11日,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的边区通讯网问题的通知》指出:“延安的党、政、军、民、学各机关须由党支部指定一定数量之同志担任《新中华报》通讯员。”同时,也有专人负责组织边区各地工农通讯员为该报写稿,曾在延安新华社工作的缪海楼就多次“组织延安机关、学校、工厂、部队和陕甘宁边区各县通讯员为《新中华报》和新华社写稿、改稿和回信;定期召开通讯员小组座谈会,谈当前报纸宣传报道要求和写作的基本知识”。1940年6月,《新中华报》参加了边区新闻业务刊物《通讯》的编委会,进一步提升了该报通讯员的思想修养和采

访写作水平,增强了《新中华报》新闻报道的规范性和思想性。

《新中华报》改版之前,版面多有变化,初期为两版或三版,1937年11月4日后,定型为四版,逢纪念日还会有增版。第一版有大量针对国内、国际、边区热点事件的“社论”“短评”,以及“国际新闻”“抗日消息”“前线抗战捷报”“要闻简报”“战局一瞥”“五日国际”“五日时事鲜闻”,主要内容有反映日军侵华和日本国内动态,介绍抗日战争战况,报道国共两党军队抗战战绩,分析国际政治、战争形势。

第二版载有“日本政潮”“最新消息”“战地速写”“战地通讯”“老实话”“五日延安”“边区短讯”“小评”“来信”等栏目,该版内容较杂,分类不定,有国内国际形势的分析,也有对边区民众日常工作学习生活的反映。

第三版为边区内部消息,有“陕甘消息”“特载”“老实话”“边区短讯”“延安短讯”“读者来信”等栏目,重点突出边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教育发展状态,展现边区各项建设成果。

第四版为副刊,先后开辟有“青年呼声”“教育”“工人之路”“特区工人”“特区文艺”“边区文艺”“边区文化”“国防教育”“动员”“经济建设”栏目,“青年呼声”则最具特色,每期的报头字体均不一样,吸引了青年儿童的关注。

“全国报纸中最好的一个”

《新中华报》改版以后,“政治责任更加严重了”,表现在“代表中央政策主张等社论专论之增多,将表现在国内

国外重要新闻的增加,将表现在对全国军民的英勇抗战业绩更广泛的表扬,将表现在对八路军新四军及其所领导的抗日游击队的抗战经验更有系统的介绍,将表现在对陕甘宁边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各方面生活更有系统的反映”。

1939年2月至1941年5月,《新中华报》除延续前期的办报风格外,报道内容逐步增多,社论、代论、专论、短评、时评、专载、转载、特载、通讯、特写、专访、三日国际、三日战况、国际简报、国内要闻、边区消息、边区生活、党内批评、批评与建议、读者信箱等栏目诸多,其他如选举运动、宪政运动、生产运动、救国公粮运动、国民精神总动员、新文字运动、学习运动、守时运动、防疫运动等特色栏目,皆见诸报端,栏目设置相对固定。

《新中华报》的中缝,内容丰富。物价变动、卫生科普、代购代邮、寻人访问、失物招领、离婚声明、鸣谢启事、遗失声明等均时常刊发。此外,售书售物、餐饮住宿、储蓄收购、金融借贷等广告也可在中缝找到踪影。这不仅便利了边区民众的日常生活,也使该报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增加了读者的阅读兴趣。另外,《新中华报》每个版面的两侧皆刊有标语口号,以呼应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开展的中心工作。为推广新文字运动,该报的报头既有汉字书写,也有新文字“Sin ZhongXua Bao”,表明该报对新文字身体力行,也吸引了新文字学习者对报纸的关注。

毛泽东评价《新中华报》为“全国报纸中最好的一个”。《新中华报》的“好”不仅体现在内容上紧随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也表现在形式上的灵活性、多样性、大众性,更体现在读者群体的广泛性、报纸与读者联系的密切性。

《新中华报》大量刊登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的文件、规定、指示、条例、纲领、党政军领导人的文章著述,刊发新闻评论,创办各类副刊、开设多种栏目,报道典型事例,并综合运用歌曲、诗歌、戏剧、话剧、谜语、快歌等大众化的形式传播并解读中共中央与边区政府的各项政策,版面设置多样且趣味性强、可读性较强,数量颇多的“声明”“探访”等,又为该报增加了浓厚的人情味,符合边区民众的知识文化水平,因而,读者覆盖广泛,党政军民学皆以阅读该报作为日常工作生活的一种习惯,说明读者对该报的关注度较高。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新闻系)



汤用彤破格擢升季羨林

崔鹤同

1946年夏,在德国留学10年的季羨林回到了北平。一天,他去北京大学文学院拜见院长汤用彤先生。

这是季羨林第一次见汤用彤。汤用彤告诉季羨林,他已被聘为北大副教授,令季羨林大喜过望。晚上,汤用彤还设家宴招待季羨林。更令季羨林没有想到的是,过了一个星期,汤用彤忽然告诉季羨林,他已经被聘为北京大学正教授兼新成立的东方语言文学系系主任,并且还兼任文科研究所的导师。

当时,季羨林是个30多岁名不见经传的毛头小伙子,所以他既感到光荣,又感惶恐不安。季羨林到晚年对此依然感慨万千:“我心里最清楚:背后这都出于汤用彤的垂青与提携,说既感且愧,实不足以表达我的心情。我做副教授之短,恐怕是前无古人的,这无疑是我人生的新纪录,后来也恐怕没有人打破的。”

这当中虽然得益于陈寅恪的推荐和胡适、傅斯年的认可,但起决定作用的还是汤用彤的慧眼识珠。他根据季羨

林的学术经历和著述成果,以及为人处世的能力,断定其为可用之才,堪当大任。汤用彤在北大图书馆专门为季羨林安排了一间教授研究室,所有有用的资料都从书库中方便提取,又派一位研究生做他的助手。该研究室后来扩展成为沿袭至今的“季老工作室”。

季羨林来北大后,当年下半年一开学就以“学生教授”或“教授学生”的身份,听汤用彤的“魏晋玄学”课程。他说自己是汤先生“班上最忠诚的学生之一,一整年没有缺过一次课,而且每堂课都工整地做听课笔记,巨细不遗”。那一大本笔记,季羨林一直保存完好。他认为自己是汤用彤的“私淑弟子”,了了一个夙愿。季羨林每每写出新作,都首先送给汤用彤请求指正。他说:“我之所有能写出几篇有点新见解的文章,不能不归功于锡予先生之赐……他的意见,哪怕是片言只语,对我总是大有帮助的。”

汤用彤对季羨林的关怀和帮助,影响和激励着季羨林的一生,也使季羨林成为继汤用彤之后,我国东方学研究的又一位领军人物、国学大师。



顾颉刚另类纳贤

段慧群

1962年,顾颉刚到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尽快完成《尚书》今译”是他的计划之一。

研究所副所长黎澍告诉顾颉刚:“你可以自荐研究生。”顾颉刚有了一个人选,是南开大学王玉哲教授的研究生李民。他联系南开大学的王玉哲教授,说明了情况。王玉哲想,自己带的研究生李民能被顾先生看上,这很难得,应该支持。

不久前,李民完成了毕业论文,题目是《〈尚书·盘庚篇〉的研究》。王玉哲曾将此论文寄给顾颉刚审阅,7月份,顾颉刚还邀请了李民面谈。

9月,李民愿来当研究生,然而此事不甚顺利,教育部没有立刻应允。副所长黎澍知道顾颉刚想找一个合适的助手,一开始却不明白为何一定要选李民。

顾颉刚后来揭开了谜底。原来,李民的论文中所述《盘庚篇》的制作时代为西周初年,这一结论与顾先生所持“东周说”不同,但李民并未因为顾颉刚的“东周说”而改变原有的观点。顾颉刚十分支持他这种做法,还为他找出几条有利于“西周说”的证据。在顾颉刚看来,像这样敢于挑战权威、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不正是最好的助手吗?

早在北大哲学系任教时,顾颉刚就有一个开卷考试的评分规定:“抄我观点者,替人家背书者,低分;自有观点者,或驳我观点能自圆其说者,高分。”可见,顾颉刚一直就想培养能独立思考的人。

1963年1月,经各方疏通,李民终于来到历史所,和刘起钎、顾颉刚一起,在总结前人已有的成果上略加新的见解,顺利完成了《尚书》今译的工作。



金岳霖的幽默

沈治鹏

有学者称金岳霖是“中国哲学第一人”,一个泰斗级的人物,一般人都觉得他应该是不苟言笑的。其实,他天真浪漫、率性而行,总是按自己的志趣去生活、去做事,从不为名利所累。他的一生是跟朋友们度过的,他的风趣和幽默,总引来高朋满座。

在西南联大,逻辑是文学院一年级学生的必修课。那时学生很多,上课都是大教室,他们对逻辑课感兴趣,对金教授更感兴趣,总是坐得满满的。金岳霖上课有时要提问,这么多学生根本记不住名字,又没有点名册。走上讲台,举目一扫:“今天,穿红毛衣的女同学回答问题。”于是所有穿红衣的女同学又紧张又兴奋。虽说是单身,但他喜欢与小孩子们玩。

西南联大时期正是国难当头,环境艰苦,家家都生活拮据。他不时见周围的小孩拿着梨子和石榴四处炫耀,他也到集市去买梨子和石榴。买回后就兴高采烈地去与孩子的梨子、石榴比大小。多半他会比输,于是他就把自己的梨子和石榴送给孩子。孩子们就蹦蹦跳跳回家报喜。

金岳霖有一名言:“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1950年代初,时任清华大学教务长的周培源要他出任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金岳霖不想干,但周坚持,无奈,他只好到系主任办公室办公。可是他却不知道“公”是怎么办的,就恭恭敬敬地在办公室里待着,见没人找也没事,待了半天又跑回家看书去了。后来学校只好解除了他的行政职务。



柯仲平创作《模范城壕村》

刘志洲

1943年冬到1944年春,陕甘宁边区文艺家协会、著名诗人柯仲平率西北文工团工作团到陇东分区各县区巡回演出,历时3个多月。当文工团大队人马到陇东专区的镇原、曲子、环县、西华池等地巡回演出时,柯仲平与他们分道扬镳。他按照陇东专员公署马锡五专员的建议,去华池县采访边区特等模范村——城壕村。

柯仲平带着勤务员刘青云,骑着马前去采访。这一老一小互相照顾,柯仲平并不把那匹马当作自己的专利品,而是两个人轮换着骑。柯仲平先骑一段,把马拴在树上自己先走一段,然后刘青云再把马骑上去追柯仲平。就这样两个人换来换去,没两天就到了城壕村。一到村里,柯仲平就与当地群众打得火热。他住在城壕村支部书记——张区特等劳动英雄张财家,和张振财同吃一锅饭、同睡一铺炕。面对倾听英雄讲述他是如何领导群众创建了这个模范村的。创业难呀!外有敌特的骚扰,内有封建思想的侵蚀,张振财是经过了漫长的搏斗,才战胜了这两股势力,获得模范村称号的。

爱激动的诗人越发终日生活在激动里。白天,他东家进西家出,和群众谈心交友,倾听他们的诉说和呼声,并仔细记录。夜里,他伏案走笔,忙着把城壕村写成剧本,让文工团去排演。偏偏天不遂人愿,当他正埋头写作时,脱肛病犯了,加上胃病不进去饭。疼,他倒不怕,主要是没法坐下来写,无奈他只好用半个屁股坐着凳子,继续埋头写作。别人看着他苦,可他乐在其中,注意力都集中在写作上,把疼痛忘了。每天找他的人很多,为了把剧本赶出来,柯仲平只好把自己关在屋里,让别人从外面给门开锁。没几天,一个能上演3个小时、40场戏的大型歌剧《模范城壕村》写成了。

《模范城壕村》成功再现了城壕村创建模范村的过程,歌剧中共出现了22个人物,几个主要人物都刻画得性格鲜明。劳动英雄张振财公而忘私、献身于财家里,和张振财同吃一锅饭、同睡一铺炕。面对倾听英雄讲述他是如何领导群众创建了这个模范村的。创业难呀!外有敌特的骚扰,内有封建思想的侵蚀,张振财是经过了漫长的搏斗,才战胜了这两股势力,获得模范村称号的。

朱镜宙与弘一法师的未尽情缘

朱有发

今年是弘一法师驻锡温州100周年。辛亥志士、章太炎三女婿朱镜宙(字铎民)以未识大师一面引为生平第一憾事,但从他的晚年回忆录,以及其与马一浮、丰子恺的交往,收藏的弘体书法作品,都能让人深深感受到他对弘一法师那份情有独钟的崇敬之情。

《梦痕记》中的弘一法师

弘一法师的名字出现在朱镜宙晚年回忆录《梦痕记》里有两处。其一:“两级师范,是由前清耆耋改建的,规模相当大。吾国半生弘扬南山律宗的大德弘一法师,就是那时候艺术教员,俗名李息,别号叔同。”据他回忆,当时是1910年4月,年仅21岁的朱镜宙第一次出远门到杭州求学,在族叔朱德儒陪伴下前往浙江两级师范学校拜访倪汉波,然后由倪先生带他去杭州西大街报考浙江高等巡警学校。

别看短短的一句话,能写进并保留在朱镜宙回忆录里,那可不是一件随意的事情。《梦痕记》共有五个版本,经过四次修订,每一次重新出版时,朱镜宙都要对版本进行修订、校对,力求时代价值、用字准确和文字精练,撰写“再版序言”后印刷发行,因此页数越来越多。

“初因急就之故,大半成于病榻,时间体力均不容我有剪裁之机,因有一再艾莫重印之困扰,欲速不达,其信然已。”“记中原列各种统计,皆系十数年前资料……已无参考之价值,特予删去。”1976年朱镜宙在《梦痕记重版自序》这样记述了修订过程中的有

关情况。它也见证了朱镜宙在初版自序立下的治学态度:“有其事,必书;无其事,亦不敢妄。这样,历史方见其真实性,方能发挥其价值与效用。”由此足见弘一法师在朱镜宙心目中的位置非同一般。

朱镜宙对弘一法师十分崇敬

朱镜宙何时开始崇敬弘一法师,因目前掌握的史料有限,还不能深入全面挖掘。但是有一封1942年马一浮致朱镜宙的复信,确证了朱镜宙对弘一法师敬仰的一段佳话。据介绍,朱镜宙当时为了认识弘一法师,给马一浮写信,请其函介引见。马一浮收到书信次日10月27日回复说:“弘一法师亦久无消息,闻仍在泉州,想安隐无恙,因回故及之。”后来他在致丰子恺信中仍为此事念念不忘,将“未识大师一面,引为生平第一憾事”。

在这封书信里,马一浮除了又向朱镜宙倾诉复性书院刻书资金不足的苦衷外,他还对朱镜宙“想出家”表示相当的不理解,甚至反对。马一浮说,“唯谓时作出世想,何也?若论佛法,究竟无世间可出。菩萨视生死如游园,观今日世途荆棘,特如行废园荒径而已。若待庄严,亦赖自身。仁者趣其居曰‘维摩室’,则出世已竟矣,何须更出?”有趣的是,弘一法师出家正是受马一浮引荐的。

1942年10月13日,弘一法师在泉州晚晴室圆寂。次年,马一浮获知消息,4月19日,他写信告诉朱镜宙:“弘一法师,公所推托,惜遂迁化。失此僧宝,丧我良朋,能不悼叹?”并为迎合朱镜宙喜好“弘体书法”,马一浮又专门请其弟子王伯尹抄录他与谢无量过去作的两首诗,一起寄给朱镜宙:“亦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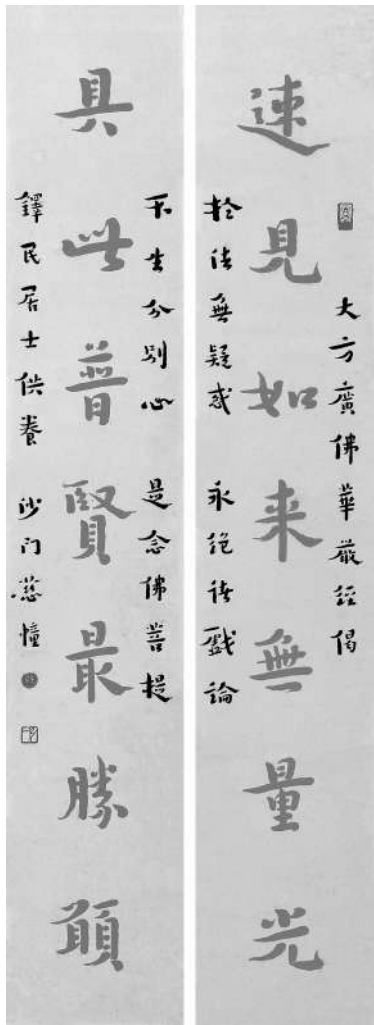
公于弘师,久欲参承,当同讚仰也。”“写诗者为山中学人王伯尹,夙好弘师楷法,颇能得其仿佛,虎贲中郎,亦或公之所喜耶?”同时,他还将上海诸位学佛人寄来的一册弘一法师纪念刊送给朱镜宙,“今亦以奉览”。

弘一法师画像“不应蓄须”

抗战胜利后,朱镜宙于1946年携带家眷返回故乡,因老家乐清房屋被日军烧毁,一家人寓居在温州城区街喜牛坦九号住所,并将志趣投向钻研佛法上。其先后在当时著名的佛教杂志《觉有情》半月刊、《弘化》月刊上,发表了《与李圆净居士书》《答张云雷先生书》《与梅振芸居士》《关于英译佛书之讨论》《读书日记感想》《威远云山洞定法师塔铭》《中国佛教会永嘉县支会募办养老院孤儿院启事》等著述。

1947年,丰子恺为弘一法师造像(即画像)刊登在《觉有情》第八卷十月号里。朱镜宙对于丰子恺发心为大师造像百尊的做法十分赞赏,勉之为“欢欣无量”。但当他发现所作的二尊弘一法师画像皆有胡须,认为此举“实非佛制,与律不合”,于是,特地走访了与弘一法师往来最密切的周孟由居士,询问“大师先前究否留须”,通过多方求证后,于10月19日给丰子恺写了一封长信,从佛门律宗视角阐述了观点,以为“造像有须,恐非大师之意”。

丰子恺对朱镜宙的来信非常重视。收信当天,即11月1日,他立马作了回复,不但赞同朱镜宙的观点,解释当时误作留须的原因,表示待日后刊印“弘一法师全集”时一定要更正。并且还说,“来示保存,异日一并刊出,以明(朱镜宙)先生对于佛法之精严,及对于弘一法师之厚爱。”后来这两封书信刊登在是年12月号的《觉有情》杂志上,标题为《关于弘一法师造像》,其后还附录了丰子恺函请编者陈无我刊出的短信。



弘一法师书赠朱镜宙

“弟世障甚深,未识大师一面,然仰止之诚,与日俱积。”从书信里还可知道,朱镜宙在此之前并没有与弘一法师接触过。那么,弘一法师书赠朱镜宙的一幅七言联“速见如来无量光,具此普贤最胜愿”(经专家认定创作于1929年前后),以及朱镜宙引用弘一法师感念母恩的著名歌曲《梦》来作为自己回忆录《梦痕记》结尾的章节主题并印入书中,更让朱镜宙与弘一法师的传世情缘增添了奇光异彩,并且带给后人无限的遐想与怀念。